

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

原名《重复的接触》

〔美〕雅各布·比姆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

(原名《重复的接触》)

〔美〕雅各布·比姆 著

潘益世等译

袁克安 邱应觉 校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81年·北京

MULTIPLE EXPOSURE
An American Ambassador's Unique
Perspective on East-West Issues

By *JACOB D. BEAM*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New York

根据纽约诺顿出版社 1978 年版译出

内 部 发 行

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

(原名《重复的接触》)

〔美〕雅各布·比姆 著

潘益世 等译

麦克安 邱应觉 校

新华书店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3017 290

1981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57 千

印数 1—9,400 册

印张 7 3/4

定价: 0.83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雅各布·比姆，是美国职业外交官、国务院研究共产党事务的主要专家之一。他从事外交工作近四十年，曾任美国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大使等职，现已退休。

本书是作者以回忆录方式概述在 1947—1973 年他任职期间亲身经历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他谈到的主要事件有：斯大林之死、德国问题谈判、波匈事件、中美华沙会谈、苏联侵捷、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谈判等。由于作者的这些经历，使他同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他的回忆主要是围绕着苏美关系问题展开的。

作者在叙述这些历史事件时，是从维护美国利益、美国全球战略的立场出发，为美国当时的对外政策进行辩护的。然而本书提供了包括中美华沙会谈在内的大量的历史资料，对于研究国际关系是有参考价值的。现予以翻译出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缓和——是引起争论的字眼吗?.....	3
第二章 斯大林时代的结束	8
短暂的个人接触	8
忧患中举行的葬礼	13
首脑易人，僵局依旧	15
第三章 德国统一问题被谈判所埋葬	18
国务院计划	18
东方和西方的立场	21
艾森豪威尔出席首脑会议前	23
一次外长会议上的失败进一步得到了肯定	26
第四章 在南斯拉夫的阅历	30
美国支持南斯拉夫独立	30
美南分歧	31
第五章 波兰和匈牙利国内的反抗	35
对卫星国的冷战策略	35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波兰起了点火作用	38
匈牙利——意识形态上的造反变成了悲剧	42
第六章 波兰——“搭桥”的机会.....	53
对共产党领导人的新态度	53
哥穆尔卡从自由化后退	58

人造地球卫星——重整声势	60
同警察控制“斗法”	63
天主教——共产主义最坚决的竞争者	65
拉帕茨基计划	67
与苏联集团的一个国家进行经济谈判	69
一次戏剧性的访问	72
偷偷的一瞥	77
第七章 华沙——中美会谈	81
一项新的使命	81
第一阶段	83
谈判中断——中国的威胁	86
美方的主动是决定性的	89
“美国代表”安排会谈场所	90
第一轮会谈	93
杜勒斯提出我们的最后建议	94
我们在华沙谈到其他事项	99
肯尼迪倡议	103
第八章 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伟大的尝试	107
经华盛顿到布拉格	107
战后的麻烦	108
诺沃提尼——并非架桥人	111
两起严重事件	117
诺沃提尼被赶下台	119
第九章 高速度的改革	124
杜布切克——最初的印象	124
每个人都想参加	131
做生意的努力	134

苏联人露出凶相	137
西方的反应	140
是协议还是最后通牒?	142
第十章 苏联人在暗中下手	148
一个电话	148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采取行动	153
结尾的前奏	158
一些结论性的比较	161
美国的作用	164
第十一章 关系正常化——经过审慎考虑的努力	166
“新尼克松”的新面貌	166
恼怒与事件	173
第十二章 苏联事务——国内问题的特点	179
非正式接触的扩大	179
不同政见——一个国际问题	184
俄国人对自己的看法	187
第十三章 1970 年——征兆忧喜参半的一年	194
不祥的开端	194
西德问题的解决	199
第十四章 开始水到渠成	203
贸易和“联系”	203
对华联系	205
第十五章 尼克松的最高级会谈	211
前奏	211
紧张合作的一周	214
武器协定	219

第十六章 有待补救的幻灭	224
早期对首脑会议的反对意见	224
尼克松—勃列日涅夫轴心	231
“汇合”和意识形态	232
克里姆林宫里的武器和人	234
彼此失去幻想之后	236

前言

13

如果我只是写我个人的回忆录，那我就应该从日内瓦写起。1931年，我在那里开始担任副领事兼临时的译电员，以应付领事馆由于1932年举行世界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讨论日本侵略满洲而激增的来往电报。那确是久远以前的事了。最近我同几位大学毕业生谈话时回忆起那些日子。这些青年多数都不知道当年我们和英国迫使日本接受三国主力舰保持五：五：三比例这件事的意义。

1935年，我被提升为我国驻柏林大使馆的三等秘书。看看今天的西欧，回首那时以后的五年，我很难完整地回忆起当时的恐怖经历了。但是翻阅一下我的朋友比尔·夏勒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①一书，当时的情景还能很快地回忆起来。¹⁴驻德使馆人员的资历都相当老，我的资历最浅，所以一些稀奇古怪的差使都叫我去做。我们的大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威廉·E·多德，他派我开车去达莱姆听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尼默勒牧师的反纳粹布道演讲，回来要作汇报。这种活动通常是在每星期天上午七时举行，很不方便。我的厨师有个堂弟是德国秘密警察，此人总是去教堂听讲道的，于是我就设法每次从他那里搞到一份记录，这才解决了问题。

^① 威廉·L·夏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三联书店都出版过中译本。——译者

我在国务院德国科呆了短短的一段时间，于1941年被派往伦敦，最后当了被英国人誉为敢于仗义执言的约翰·怀南特大使的私人秘书。我没有留下堪与那段时期的历史著作相比的有趣的回忆，但我确实结识了当时的一些总理、首相、国王（包括那些在伦敦流亡的）和陆、海军将帅，同他们谈过话（多半是在电话上）。

1944年底，我参加了罗伯特·墨菲大使的班子进入被占领的德国，在那里他是国务院最高级代表，同时是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政治顾问。我有幸在那段时间与他共事，看到他开始他杰出的外交生涯，后来一直做到驻日本大使和副国务卿。

我随墨菲大使在德国工作一个时期后，于1947年被任命为国务院中欧科科长。从此我就卷入德国事务，而且着重于德国同苏联的关系方面。顺着这条途径，我身不由己地同苏联问题和有关的共产主义问题结下不解之缘。我在这里叙述15 的是1947到1973年这段时期。我打算采取个人回顾往事的方法，来说明和强调历史事件的意义，同时又不过多地打乱时间的顺序。我希望其中的某些新的见解和认识能使有识之士也发生兴趣。

我感谢国务院允许我查阅我所经手的文件，感谢威廉·斯帕罗先生及其同事帮我找到了所需的档案。国务院的研究部门提出过有益的建议。我非常感谢在国务院服务多年的秘书桑德拉·佩克托尔女士，没有她的快速、准确和耐心的帮助，本书是不可能问世的。最后，还要感谢诺顿出版公司副总经理埃文·托马斯和他的助手罗斯·弗兰科女士，在他们的热情指导和支持下工作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第一章 缓和——是引起 争论的字眼吗？

19

我在美国外交界服务四十年，历尽美苏关系的沧桑。1973年初我从外交界退休时，正值所谓缓和和高涨的时代。

象缓和这样的口号，在那些想拿它来追求个人目的的人中间是很吃香的：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可以用它；杰克逊参议员和罗纳德·里根也可以用它。还出现了一种怪现象，这个口号引起了美国一些同床异梦人物的奇怪的临时组合：银行家和大企业家接过左派和知识分子的任务，大力支持同苏联搞好关系，而后者却变成对苏联的最严厉的抨击者。

缓和一词虽然是个外来语，它的定义却是一种高尚的目标，最好的译法大概是用多音节的俄语所表示的“紧张局势的缓和”。正如张伯伦—希特勒时期的“绥靖”政策那样，缓和的名声不大好，因为人家把它和袒护一个令人憎恶的政权等同起来。同苏联搞缓和，是过去长期进行的激烈冷战的反作用。就这个意义来说，缓和有健全的基础，是摒弃过去徒劳无益²⁰的行动的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另一方面，它也抹杀不了美苏关系中反映根深蒂固的历史性分歧和根本矛盾的那些先例，它们仍然影响着两国人民的观点和行为。

不妨回顾一下几乎已被人们遗忘的过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们同俄国人没有什么直接的牵扯。那时我们倾向于

把他们看成是遥远的和有点古怪的民族，不过我们同沙皇政权的关系还是好的——除非我们对他们虐待犹太人提出了抗议。直到现在，我们对犹太人的关怀还影响着两国的关系。

当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为结束1904—1905年日俄战争而召开的朴茨茅斯会议上所以偏袒俄国人，大概更多地是由于担心日本人变得过分强大，而不是由于对俄国人有什么好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皇倒台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担心促使我们对俄国进行干涉——顺便提一下，这次是同日本一起采取行动。这一点有时候倒是值得提起莫斯科现在的统治者注意的。

然而苏联人从来没有忘记西方的干涉和丘吉尔表示打算“把婴儿扼杀在摇篮里”的言论，这笔旧帐现在仍然影响着苏联对西方的态度。对我们美国来说，布尔什维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执行内部颠覆和破坏的政策，变得非常讨厌，但也至多如此。就国际范围而言，他们关起门来自己搞自己的，顶多只构成一个欧洲问题。

奇怪的是，美俄在三十年代初正式建立政府间的关系之前，²¹ 双方的接触总的说来是频繁的。当年的情景很象今天，在苏联到处都可以见到美国商人，他们有些人经营得非常成功。然而，好象命运注定似的，随着两国政府交往越多，关系却越来越紧张。

即使在我们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期而然地结为盟友的期间，情况也是如此。苏联人故意贬低我们所作的贡献。由于他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从他们的观点出发，也许这是可以理解的。总之，互相指责和深刻的猜疑使双方的合作时常

蒙上一层阴影。战时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团长约翰·迪恩少将所著《奇怪的联盟》^①一书，对这段历史作了叙述。

如今，冷战已成了引起争论的题目，修正派历史学家对它的起因作了新的解释。冷战主要是从处理战后德国前途的问题上的斗争开始的，然后随着共产主义体系力量的起伏而波及全球。总起来看，冷战一直使我们远比苏联人更为难受。

苏联几乎没有在公认的战斗中丧失一兵一卒，它只是怂恿或支持别国采取军事行动来抗击美国帮助盟国抵御共产主义的军队。

他们在朝鲜、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挑起代价昂贵的对抗行动。

他们挫败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努力。

他们奴役了东欧，所付的代价很小，无非是道义上遭到一些损失。

如前所述，目前对缓和表示的许多怀疑和保留，是根据同 22 苏联更频繁地打交道的经验中产生的。首先，我们不喜欢俄国的专制传统。这种传统由来已久，只偶然为昙花一现的神秘主义和呼吁自由的声音所缓和。当然，俄国的种族主义即使在今天也仍是国内和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因素。不管对还是不对，俄国人从来没有讲真话的很高信誉，他们本国的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也曾谴责这一点。共产党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道德标准，更降低了这种信誉。

当然，苏联领导人不信任我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理由。除

① 约翰·迪恩：《奇怪的联盟》，纽约瓦伊金出版社 1947 年版。

了1918到1921年遭到盟国的干涉外，他们对我们在冷战中的行动感到恼火，认为这些行动是否认他们有推进革命的意识形态上的权利和使命。

对当前美苏关系的估计应该全面一些。我们还刚从缓和的初期成果中获得好处。现在我们已经暂时摆脱了可能发生另一次柏林封锁的恶梦。在今后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苏联还不至于向欧洲本部进行直接的军事威胁。我们对苏联的贸易有着巨额的顺差，大部分可按短期至中期贷款的条件收回硬通货。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虽说还处于初期阶段，但至少可以用来促使两国对威胁双方的危险能有头脑清醒的了解。

然而苏联继续同我们对抗，公然把我们看作死对头。尽管战略力量的平衡也许会抑制双方之间发生公开的军事冲突，但苏联很可能会在世界外围地区寻找、制造和利用“次危机”。

正当美国逐步实行军事脱身的时候，苏联却不断提高其以实力影响遥远目标的地位。在某些领域，苏联无疑要力争化均势为优势，也许还会跃跃欲试，更多地利用顺从的代理军队，正象它在安哥拉所做的那样。一句话，苏联把它集结军事实力的意图掩盖起来了，这是不祥的兆头。

我用序论的形式着重谈到苏联，这是因为它是共产主义大本营，是美国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同它周旋和争雄的劲敌。虽然苏联称霸世界的野心受到它势力范围以外的国家越来越频繁的挑战，但是广阔的地区依然处在它的奴役控制之下。由

于我有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工作过的经历，我以这个背景研究苏联的情况时总感到东欧的命运实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可怕的遗产。人们不禁要问，苏联在那里的统治会象鞑靼人和土耳其人的统治那样长久吗？历史上的那两次征服曾经使亚洲和地中海文明停滞了几百年。

把我们现在可以同中国共产党相接触的情况与1958年他们在华沙同我谈判台湾海峡危机时表现的极端敌对态度作一对比，我感到有理由表示乐观。由于远东最近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同中国直接打交道的能力势必加强我们作为一个太平洋大国的地位。缓和或者任何有利于交往的事情可以使我们成为一个独特的因素，这个因素各个共产党国家在形成自²⁴己的策略和对外关系(甚至包括它们彼此间的关系)时都必须加以考虑。依我看来，现在有不少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对我们抱着这样的心情：“我们希望你们灭亡，但是在你们灭亡之前，我们发现你们在跟前还是颇有用途的。”

第二章 斯大林时代的结束

短暂的个人接触

在战后斯大林主义时期，美国 and 苏联之间缓和紧张关系的机会是很稀少的，也是分散的。由于强敌德国和日本土崩瓦解，只要政治上不受妨碍，苏联就利用其陆上压倒的力量尽量占领和吞并领土，特别是在东欧以及在远东的某些日本属地。在其他一些地区，苏联向外试探，到了要动干戈的程度，例如它占领伊朗北部的阿塞拜疆省并企图把它从伊朗分裂出来形成另一个共产党卫星国。

苏联把德国看作战利品，它在战后利用西方国家对柏林的脆弱的军事控制，不断试图破坏它们的地位。当然苏联也有一定的理由担心，西方 1948 年春在西柏林采用一种同西德金融体系挂钩的稳定货币，会威胁苏联在德国的重大利益。于是发生了 1948—1949 年封锁西柏林的事件，这在苏联人
26 看来，作为对西方进行报复和施加压力的手段，是值得一试的。

在伊朗和柏林，苏联还是让步了。美国当时握有对原子弹的垄断，无疑是一个原因。但看来还有其他一些起作用的因素，其中的一条就是苏联从政治上考虑决定避免同美国发生不可挽回的决裂。

有趣的是，在柏林问题上，苏联封锁的借口是，西方国家

单方面采取了破坏四国共同管制柏林制度的步骤，从而丧失了它们在该城市的权利。但无论苏联方面还是我们方面，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宣布废除规定“对包括柏林在内的整个德国”实行四国共管的1945年8月波茨坦协定。双方都不愿意因此而丧失占领国的权利。双方都认识到保留一定的法律根据是有好处的，以便有朝一日在德国问题上达成协议。

斯大林在世时定期举行的四国外长会议也遵循这种格局。苏联的挑战逐步加码，范围也扩大了。共产党1946年底在希腊和土耳其搞颠覆的结果，产生了杜鲁门主义。这件事间接导致了1947年2—3月间讨论德国问题的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垮台（可能随后又促成了1948年对柏林的封锁）。最为严重并使我们付出极高代价的，是苏联介入并支持北朝鲜进攻南朝鲜。当时人们越来越担心莫斯科—北京轴心国的力量（其实那时双方的关系已开始下降）会在全世界进行冒险，而眼前在1948年夏天，苏联会入侵南斯拉夫以镇压它的违抗。²⁷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后，美苏关系有可能出现转折点。我有幸亲自看到了那个时期的一系列事件。在此之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乔治·凯南已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在路过柏林时发表了一篇谈话，说苏联的做法同纳粹德国的做法相似。（由于凯南和我战前都在柏林工作过，我可以理解他是按捺不住而说这种话的。）这次事件发生后，我被指定为临时代办，接替他当馆长。

回顾起来，凯南从1952年春到同年9月在莫斯科短暂任职的经历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他知识渊博，精通俄文，对苏联